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7528283/answer/84002858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美精神分析在今天的盛行是由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爆炸式发展（psychoanalytic boom）所一举奠定，而影响后者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性的。一个必须被承认的事实是：**南美现代史上军事独裁统治的黑暗时期，也恰恰是南美精神分析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特点早在 1991 年就已经被德里达准确地指出：

What I shall from now on call the Latin America of psychoanalysis is the only area in the world where there is coexistence, whether actively adversarial or not, between a strong psychoanalytic institu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a society on the other (civil society or State) that engages in torture on a scale and of a kind far surpassing the crude traditional forms familiar everywhere.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得先回到历史的开端。精神分析在南美的萌芽几乎与它在欧洲的发展同步。二十世纪初，随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一门前沿的心理理论范式出现，精神分析运动很自然的以维也纳为中心向外开始扩散。1899 年，当弗洛伊德的《释梦》还没有出版时，巴西医生 Juliano Moreira 已经在谈论他的早期著作。1914 年弗洛伊德出版《精神分析运动史》，里面提到了 1910 年智利医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精神分析的报告。秘鲁的 Honorio Delgado 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和弗洛伊德的长期通信。精神分析学说在南美大陆的迅速传播一方面得益于早期欧洲殖民者已经开拓的美洲通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美新兴的独立国家们的政策导向。欧洲的先进思想引入后被用来指导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工程。比如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的统治时期（1930-1945），和儿童成长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是施政重点。类似于美国同时期的心理清洁运动（Mental Hygiene Movement），巴西在大力推进“健康、受教育的和爱国主义的青年”工程时逐步确立了儿童精神分析的合法性地位。

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南美精神分析的发展赶上了世界精神分析运动的几个高潮时刻。首先是三十年代因为欧洲法西斯上台而产生的分析家移民，其次是二战后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主导的体制化运动。精神分析在这一阶段从心理学的“另类”变成主流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精神分析机构化和分析师的职业化；精神分析理论在大学心理学教育中的霸权地位；精神分析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扩散。在阿根廷，虽然庇隆主义者对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权阶级的“奢侈消费”不敢兴趣而力主回归天主教道德教育，但阿根廷中产阶级群体在这一阶段的成形为精神分析提供了最佳受众。

1964 年，巴西军事政变开启了长达 21 年的军政府统治。而在阿根廷，短命的平民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的混乱局面终结于 1976 到 1983 的军事独裁。正是在这一时期，南美主要两国的精神分析得到了迅猛发展。五十年代里约热内卢有三家精神分析机构，七十年代后期这个数字是两位数。1974 年巴西联邦心理学委员会成立时有 895 名注册分析师，第二年这个数字增长到 4950。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在这一阶段因为拥有最高的精神分析师人口比例而成为“世界精神分析之都”。

从历史来看，精神分析能够在威权政治下的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不应该让人惊讶。弗洛伊德被纳粹迫害逃离维也纳以及德国法西斯强行解散德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历史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精神分析内在的革命性和颠覆性使其与极权主义水火不容。但事实上，在马赛厄斯·戈林领导的纳粹精神治疗机构中依然存在着精神分析的实践，弗洛伊德和琼斯等人也接受了非犹太分析师为纳粹工作的事实；1938 年以前，精神分析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照常运作，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的荣誉主席是狂热的法西斯者；在西班牙，得到 IPA 承认的精神分析协会是在弗朗哥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如果欧洲经验证明精神分析可以在极权主义下生存，那南美经验进一步表明威权政治也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壮大的土壤。在南美六七十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精神分析虽然没有得到官方背书，但也从来没有作为一门理论和职业被专门迫害。1979 年，在阿根廷政治迫害的顶峰时期，APA 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的精神分析组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组织上，IPA 领导下的精神分析分会作为各国精神分析事业发展的领导力量在政治上极端保守。看看 **Wilhelm Reich** 是如何因为马克思主义倾向被安娜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从 IPA 驱逐，我们就知道精神分析的建制不可能成为任何公民行动或者统治者眼中的“反动力量”的温床。弗洛伊德在讨论分析技术时强调的分析家的中立性和脱离在精神分析组织层面演变为去政治化。在六七十年代，巴西和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的官方立场都是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斗争，在大规模的绑架-审讯-人口消失的国家恐怖背后扮演沉默的旁观者。而著名的 **Cabernite-Lobo** 事件揭示了也许精神分析的官方机构在默许它的成员在国家机器的暴力行径中扮演更不光彩的角色。

在实践上，精神分析充当了政治高压环境下个体心理的避风港。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导致公共空间的消失，个体社会政治参与自由严重受限。政治幻灭的中产阶级和青年一代转向精神分析营造的私人空间来寻求自我理解与认同。精神分析把外在社会冲突解读为内在心理冲突的做法也迎合了这种倾向。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收入提高、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消费习惯的现代化是精神分析职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而从政治世界向主体世界的转向让团体分析、个体分析、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的分析活动大受欢迎。哪怕在 1976 年军事政变后，阿根廷大学中的精神分析课程纷纷关闭，教授学者被迫出逃避难的情况下，私人门诊中的精神分析实践依然可以正常运作。显然，精神分析只要不在公共领域影响文化或政治转变，私人领域的“个体成长”是被接受甚至鼓励的。

在理论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词汇作为一种常识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阿根廷的军政府会强调父权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性来强化传统家庭观，精神分析的诊断理论也被军方拿来把社会越轨行为病理化。在正统精神分析理论之外，阿根廷和巴西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六十年代通过阿尔都塞的“回归马克思”接触到拉康的“回归弗洛伊德”。出于对克莱因理论统治下的精神分析建制的保守性的厌倦，拉康派理论因为自身的社会维度而很快以一种反文化运动流行起来，成为南美精神分析格局的必要补充并在八十年代之后成为主流。以这样一种方式，精神分析在没有外部话语竞争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己的内部更替，从而适应了后独裁时期的社会需求。

同样在七十年代，精神分析在美国由盛转衰。在大学里科学心理学逐步取代精神分析课程，在临床上认知行为疗法的兴起以及日后发展起来的精神药物产业使得精神分析实践边缘化。然而类似的冲击在阿根廷和巴西并没有发生。由于语言的原因，英语系国家的经验主义相比欧陆思想对南美学术界并没有很强的吸引力。六十年代出现的 CBT，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在阿根廷有限地发展。而二三十年代南美学术界在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柏格森影响下出现的“反实证主义运动”，直接使得科学心理学在九十年代前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七十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曾对精神分析提出了有力批判，而在南美类似的运动没有出现。威权政治的环境维持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力，身份政治没能有效稀释精神分析话语的解释力。

在后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南美精神分析凭借之前建立起来的制度基础、教育体系和文化积淀维持了霸权话语的地位。虽然拉康把大学话语和分析家话语做了明确区分，但阿根廷拉康主义的统治恰恰是因为其牢牢抓住了大学系统里的心理学院系。拉康派反对心理学化，却要求心理学家的培训必须拉康化。

Andrew Lakoff(2003)曾经观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精神病院的一个有趣现象：拉康派分析家也会开精神药物的处方，但药物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好病，而是为了让病人维持基本的神智清醒和表达能力从而可以接受拉康派的话语治疗。通过公共卫生体系所保障的每年 30 次精神分析疗程(**Guido Pablo Korman, etc., 2015**)，精神分析在阿根廷维持着自己的普及性和统治性。然而这座堡垒并不是密不透风的。认知神经科学的课程挤进了高等教育。CBT，私营保险公司的赔付方案和更加激进的药物治疗在改变南美的心理文化。精神分析的南美道路还能走多远有待检验。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我导师写的关于巴西精神分析发展史的几篇文章：

Rubin, A., Mandelbaum, B. and Frosh, S. (2016) 'No memory, no desire': Psychoanalysis in Brazil during Repressive Times.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8(1): 93-118

Mandelbaum, B., Rubin, A. and Frosh, S. (2018) 'He didn't even know there was a dictatorship': The complicity of a psychoanalyst with the Brazilian military regim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20, 37–57.

Frosh, S. and Mandelbaum, B. (2019) Psychosocial Histories of Psychoanalysis. *Revista Praxis y Culturas PsiSantiago de Chile*, enero 2019, N° 1, 1-13 (<https://praxispsi.udp.cl/index.php/praxispsi>)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7528283/answer/840028588>